



博览之窗

周恩来与北京站的建设

众所周知,作为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站,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工程。当年,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周恩来。从建筑模型到施工现场的工程质量,每个环节都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。从当时的形势看,建设一个新的北京站,对新中国的首都来说太重要了。

周恩来对北京站的设计方案非常满意,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。比如在原设计方案中,北京站的钟楼只有中间两个。周恩来看完图纸后提出,在两个钟楼外侧再各加一个角楼,整体效果会更好。按照周恩来建议修改建成的北京站,在40多年后的今天,即使周围高楼林立,仍不失其雄伟、壮观的民族风格和气势。

当设计方案确定后,周恩来关切地问:“工期这么紧,你们能不能完成任务?”铁道部领导和工程总指挥部人员当即立下军令状:“保证提前完成任务。”施工期间,周恩来几次到工地视察,给建筑工人和参加义务劳动的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。尤其是1959年3月18日那天,周恩来戴上安全帽,亲自攀上几十米高的脚手架,俯瞰着整个工地热火朝天的建设情景。

从1959年1月20日开工兴建到9月10日竣工,仅用了7个月20天的时间。一座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的火车站便建成了。

新北京站在9月15日交付使用,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为北京站开通剪彩。毛泽东于开通当日凌晨,亲临北京站视察并题写了站名。当

时,毛泽东题写的“北京站”三个大字挂在两个钟楼下边、进站大门上方。后来,根据周恩来的提议,把“北京站”三个大字移到两个钟楼之间的建筑物之上。

(摘编自《中华儿女》2003.5 李荣昌 文)

毛泽东结缘京剧

工作闲暇的时候,毛泽东最大的爱好就是听京剧。

毛泽东最早接触京剧是在1918年到北京之时。那一年,他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,闲暇之余便游览北京的大街小巷及风景名胜。北京城内的京剧舞台群星灿烂,相互争辉。毛泽东耳濡目染,渐渐地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在延安时,毛泽东与江青结婚。江青的到来为毛泽东丰富了京剧知识,拓展了京剧艺术的视野。原因很简单,因为江青是科班出身的京剧演员。江青14岁时便报考了济南市的山东戏曲学校,学习的主要课程是京剧表演艺术。后来,江青又考入山东实验剧院。

江青从上海到延安,除带了几本影集外,还带来了一架手摇留声机和一些京剧唱片。在延安那艰苦的岁月里,毛泽东在工作和学习之余,江青总是为毛泽东放上几盘京剧唱片,使毛泽东得到精神上的调节。为此,毛泽东常常向江青笑着说:“好!很好!再放一遍吧!”

那时,在延安、在陕北,江青被当作明星来看待。她戏唱得不错,时常演的是京剧《打渔杀家》中的主角萧桂英。当时的中央首长都喜欢,毛

泽东更是喜欢。

曾在延安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称赞毛泽东是一位“京剧造诣很深的鉴赏家”。

(摘编自《文史精华》2003.9 王晓飞 文)

“先斩后奏”的第一个五年计划

1951年2月14日至16日,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,毛泽东提出“三年准备,十年计划经济建设”的思想,明确指出从1953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,由此直接推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。经周恩来提议,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、陈云等人组成编制“一五”计划的领导小组,具体工作由中财委计划局负责。当年,中财委即试编出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。

1952年7月前,陈云领导的中财委初步编制出“一五”计划轮廓草案。周恩来又花了一个多月进行了一些综合整理工作,最终形成了“一五”计划轮廓草案。

1952年8月,周恩来率团到苏联访问,征询苏联政府对我国“一五”计划的意见。斯大林强调,计划不能打得太满,必须留有后备力量,以应付意外的困难。斯大林的意见对我们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。

1952年底至1953年初,陈云根据中央指示和苏方提出的意见,组织中财委和国家计委的力量,对“一五”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。由于“一五”计划中的重点——苏联援助项目未能最后确定下来,因此,陈云仍然拿不出一个完整的方案。“一五”计划实际上不得不在边建设边计划中进行。1953年6月后,国家计委开始对“一五”计划进行第四次编制,但由于种种原因,这一次编制仍不能令人满意。

1954年,正式编制具体详细的“一五”计划草案的条件已成熟,毛泽东决定全面加速“一五”计划草案的编制工作。1954年2月12日,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陈



云、高岗、李富春等人组成编制“一五”计划工作小组，由陈云任组长。

1955年3月，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，讨论并原则通过了“一五”计划草案。会后，中共中央根据会议讨论中所提意见，并再次征询苏联意见，对“一五”计划作了适当修改。7月30日，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“一五”计划。而此时，“一五”计划已实施了两年半。

(摘编自《世纪》2003.5 叶扬兵文)

华罗庚入党记

1950年3月，华罗庚从美国回到了祖国，执教于清华大学，任数学系主任。1957年整风运动期间，华罗庚参加了《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》的写作，被认定是滑向右派泥坑的“边缘人物”，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压力。

1958年春，反右运动进入了尾声，但全面“大跃进”的锣鼓又敲响了。在知识分子中间，交心运动、红专问题大辩论拉开了序幕。6月，华罗庚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全体员工大会上表示，立志要加入伟大的共产党。但是，他并没有正式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。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来说，这种口头性的表态并不算数。进入七八月，中国数学界的“拔白旗”运动走向高潮，华罗庚首当其冲，成了一面“大白旗”。

“大跃进”的潮水逐渐退却后，1963年，华罗庚向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申请书。可由于当时人们“左”的思想作祟，华罗庚的积极要求并没有引起重视。1964年，已调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华罗庚，第二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，依然石沉大海。1967年，对党一往情深的华罗庚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，仍杳无音信。

1979年3月，华罗庚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。同年6月13日，华罗庚被吸收为中共党员，时年70岁。当时，他正在英国访问。从海

外归来后，华罗庚赋诗言志，写了一首《破阵子·奉答邓大姐》：

五十年来心愿，三万里外佳音，
沧海不捐一滴水，洪炉陶冶砂成金，
四化作尖兵。老同志，深愧作，
新党员，幸勉称，横刀那顾头颅白，
跃马紧傍青壮人，不负党员名。

邓颖超深为华罗庚的情怀所感动，她给北京《支部生活》杂志写信说：“他的诗，使人读了很受教育，很受鼓舞。科学家的态度、雄心壮志的誓言，跃然于诗句中。”

(摘编自《纵横》2003.8 张锡金文)

罗舜初替许世友“说情”

1937年，许世友和罗舜初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，被分在了同一个班，两人成了好朋友。许世友向罗舜初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进入少林寺，如何参加红军的曲折经历。罗舜初向许世友谈了自己当年如何参加农民暴动，到红军总部后当作战参谋的过程。

许世友年长罗舜初9岁，当时已是三十多岁，而罗舜初当时只有二十来岁，在这个由师以上干部组成的班里属于小字辈，许世友便称他为“小青年”。罗舜初听了许世友当年在少林寺的种种经历后备感神奇，尊称许世友为“老师傅”。

学习生活结束后，罗舜初回到军委机关，许世友则被留在抗大当了校务部副部长。对于爱打仗的许世友来说，平淡的学校工作实在让他无法忍受。

有一天，许世友找到罗舜初：“‘小青年’，你是毛主席亲笔写信推荐来学习的，和毛主席熟悉，现在见他的机会也多，能不能替我求求情，让我到前线去杀鬼子，不然我会憋死的。”

于是，罗舜初便在适当的时候把许世友的想法报告了毛泽东。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：“这个许和尚，不愿干学校，愿意上战场，那好啊！你把他带来，我要和他亲自谈。”

有了毛泽东的首肯，罗舜初便把许世友领进毛泽东住的窑洞。不

久，许世友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学校，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，来到了抗日前线。

(摘编自《人物》2003.9 晓松文)

巴金与电影《英雄儿女》

1951年3月初，巴金来到朝鲜战场体验生活。给巴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志愿军某团六连了。

1952年10月，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“红山包”的主攻任务。在阵地上，六连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，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。面对疯狂的敌人，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张振川报告：敌军已冲上我军阵地，请求炮兵直接向六连阵地轰击。最后，他大声喊道：“向我开炮！向我开炮！”团长从望远镜中看到两位英雄退出防空洞后，立即下令炮兵向六连阵地开炮。阵地被夺回来了，但两位英雄却壮烈牺牲了。

战斗结束后，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，张振川团长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的英雄事迹，巴金听后非常感动，萌生了创作的念头。

1961年，应《上海文学》杂志社约稿，巴金经过多年酝酿，终于写出了中篇小说《团圆》。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读了《团圆》后，责成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电影。由武兆堤、毛烽两人负责改编。

在小说《团圆》中，巴金对王成的描述不多，毛烽和武兆堤决定对王成这个人物进行再创造。当毛烽翻看《志愿军一日》时，无意中看到文中有一句“向我开炮”，顿生灵感。于是，王成的英雄形象就诞生了。

剧本送到文化部后，夏衍指示电影局主管领导：“重点拍这部电影，胶片要从英国进口。”

1964年，电影《英雄儿女》在全国上映，随着“风烟滚滚唱英雄”的歌声很快享誉大江南北。

(摘编自《上海滩》2003.9 陆正伟文)